

场域理论下反观科学知识的构建

——读布尔迪厄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陈少妹¹,王毅杰²

(1.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2.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科学知识本性问题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所讨论的问题,布尔迪厄在《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一书中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在‘清点’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布尔迪厄凭借场域理论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指出科学是一种让某种发现面世的构建。这种建构主义的视角并不新颖,但其独特的分析方法让人耳目一新。针对其中的社会科学亚场,作者认为,只有用反观性这个武器才能增强其自律性,从而维护其合理地位。

关键词 科学知识的构建 科学场 场域理论 反观性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1-0030-05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被誉为继雷蒙·阿隆(R. Aron)之后法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一书由他2000~2001学年在法兰西学院专题讲座的讲稿集合而成。在该书前言中,他谈到,“今天的科学世界正面临着可怕的倒退的威胁”^[1]。科学在宗教、政治乃至经济的强大势力面前,一点一点争取到的自律性如今已经被大大削弱了^[1]。他认为科学正处于危险之中,因此科学本身也成了危险之物,所以特别需要对科学进行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在书中,作者首先分析评价了科学社会学的种种视角,并用场域理论对科学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由此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其社会建构性要严重得多,更需要进行自我反思。对科学场的分析是作者经典理论——场域理论的实际应用,作者认为社会科学应该以自身为研究对象,虽不是第一人,却有其独特的反思特性。

一、科学知识理论回顾

科学知识理论发展至今,有学者将之分为三个不完全独立的阶段^[2]。第一阶段的视角可以概括为“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是曼海姆(K.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以及30年代出现的默顿(R. Merton)的科学社会学,其一致性在于认为

科学知识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第二阶段可称为“历史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人物有波普尔(K. Popper)、汉森(N. Hanson)和库恩(T. Kuhn)。波普尔反对逻辑经验主义奉行的证实原则,认为科学理论从未得到过证实,而只能被证伪;汉森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提出“观察渗透理论”^[1],即任何观察都是有理论负荷的;库恩是该阶段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范式”概念、科学发展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过程的思想。第三个阶段是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知识论,即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为SSK)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3],一类是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强纲领’和利益理论,研究科学知识的产生与社会环境条件及社会结构关系,另一类是在‘强纲领’对待科学知识总观点的支配下产生的几个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

而布尔迪厄所指的‘科学之科学’特指科学社会学,即用社会学分析科学的学科。他将科学社会学理论划分为四个不完全独立的时期,希望通过对每个时期理论的清点和评析,“建立值得我们重视的‘认知风格’”^[1]^[7],即反观性^①,或者说反身性。作者划分出的四个时期依次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库恩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观、SSK中的‘强纲领’和利

收稿日期 2006-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和河海大学科技创新基金‘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课题研究(项目编号 06CSH008)

作者简介 陈少妹(1982—),女,福建尤溪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城乡社会学研究。

①反观性(reflexivity),还被译为反思性、自反性、反射性、反身性等等。反观性内涵丰富,包括自我关注、自我评价、自我批判、自我指涉、自我否定和自我对抗。不同学派和学者,对反观性有不同的解释。

益理论、实验室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新科学社会学视角)。

科学社会学的功能主义传统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默顿为代表。默顿及其追随者研究科学领域的奖酬体系,发现奖酬体系在整个功能系统中承担了一定的功能,是科学共同体通过对科学家所作贡献予以承认,从而对科学家的行为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4]。在科学的建制目标上,默顿指出,科学的通常目标就是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布尔迪厄认为,这种集体目的论观点忽视了科学界斗争随处可见的真相,是一种理想化的视角。他还指出,默顿对科学社会学职业的狂热追求,和与帕森斯(T. Parsons)-拉扎斯菲尔德(P. Lazarsfeld)一起建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假范式”,都是在“假冒反观之名”,最终使得“科学社会学就这样被当作社会的教化工具”^{[1]26-27}。

库恩科学观的关键词有范式、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详细说明了范式的涵义。一是指心理要素,它包括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信念和态度,如信念、直觉、审美、灵感、顿悟、价值取向等等;二是指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即科学共同体对该学科领域所建构的共同理论模型和解释框架,如概念、原理、定律、公式、实验技术和设备等。在范式的指导下,科学共同体开展各种各样的科学活动。据此,库恩将科学发展分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三个阶段。在前科学阶段,还没有出现同一的范式;而经过长期发展后,统一范式出现,科学发展进入常规科学时期;但是这一时期也会出现无法用范式对现象做出解释的情况,于是人们对范式产生怀疑和争论,最终产生科学革命^[5]。布尔迪厄认为,库恩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出科学的发展并非连续的过程,而是一系列的中断和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交替过程”^{[1]28};而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即由科学家组成的封闭的共同体,研究限定在明确的幅度内,所采用的方法也与研究密切配合),把科学世界描述成被中央标准统治的共同体,将科学家集体与外部世界彻底隔绝了起来,忽视了科学家集体的工作环境^{[1]29}。

库恩阐述的科学理论的诠释学性质,“极大地鼓舞了社会学家冲破科学方法的整体樊篱”;“一场由社会学家掀起的对科学知识本性进行社会学解释的风暴开始了”^[2]。英国的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便是其中的代表,主要人物有布鲁尔、巴恩斯和科林斯。其基本观点是:“所谓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真理性,都是局部的社会文化规范,是为特定人所规定所接受的惯例”;“科学事实不仅是由科学工作者和

提议者造就的,同时也是由接受者造就的”^{[1]37}。其中,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的四条基本原则,即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观性,布尔迪厄对其中的反观性“情有独钟”;巴恩斯优先考虑了利益等社会因素对科学家的影响,但作者认为他和库恩一样,没有提出科学自律的问题;科林斯和巴斯学派的实验室研究,作者认为,它的贡献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实验是一项集体工程,但局限于互动主义的视野内,没有对与信仰形成有关的结构性条件提出疑问^{[1]38}。

最后,布尔迪厄对在“强纲领”视角指导下的经验研究进路之一的文本分析进行了评述,并将主题命名为“保守得很好的公开秘密”。进行文本分析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卡林·诺尔-塞蒂娜(K. Knorr-Cetina)、伍尔加(S. Woolgar)等。他们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旨在回答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知识主张的接受和存在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科学的客体不仅是在实验室里技术性地制造出来的,而且还受到政治和象征性因素的影响”;学者有两套说辞,具体使用哪一套,视情境而定;“科学事实以书面命题的形式被建造、交流、评估,科学工作本质上是文字演绎和阐释性的活动”^{[1]47}。从以上语句可以看出,科学知识的本质是社会建构性,是科学家和接受者建构出来的,但人们却不说明这一点,使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看起来像是“保守得很好的公开秘密”。布尔迪厄认为,这是一种“符号学偏见”,也是不可取的。

要讲述科学社会学历史、对科学进行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承认自己“也有点害怕”。但是通过以上四个基本视角的描述和评析可以看出,布尔迪厄已经成功走出了半步。

二、布尔迪厄的“科学场”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作者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布尔迪厄认为,在解读社会时,应该采取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双重解读”方法。在认知方法上,应该坚持关系主义。因为“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愿’而存在的客观关系”^[6]。这些基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就是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该理论试图“通过场域、惯习和资本等基本概念,来探讨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7]。

在分析社会时,布尔迪厄认为,社会是由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场域构成。所谓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其中位置由资本分配结构和彼此间的关系所决定。场域是一个运作和斗争的空间,具有相对独立性(自律性),外界要进入这个空间,需要支付一定的“入场费”;即

需要一定的投入,如通过学习形成该场域所需的某种惯习。惯习是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表现形式是知觉、判断和行动等各种身心图式。它是人们后天在实践中‘不知不觉’获得的。同时,惯习一经生成,就反过来塑造、组织实践;新的实践又会巩固原有的惯习或培养出新的惯习用以指导之后的实践^①。所以,知识是研究者在惯习的形塑下构建的。资本是场域的另一个要素,是场域内部斗争的动力。他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经济资本等同于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文化资本是指通过不同的教育行动而传递的文化物品,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所拥有的持久的关系网络;符号资本则是指对以上三种资本的认同。关键是,资本决定了场域内各种活动因子所处的各个位置,也决定了各活动因子斗争时所具有的力量。

综合场域、惯习、资本和实践这四个概念,可以把它们的关系表述为:惯习*资本/场域=实践,即实践是具有各种惯习的行动者在场域这个空间内运作各种资本的活动。在解释科学知识本性时,布尔迪厄将分析焦点置于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实践,从场域、惯习和资本这三个纬度分析说明社会因素如何介入科学世界。

布尔迪厄认为,在实验室和导控实验工作的研究者之间存在一种由客观关系所构筑的结构,即其间各种力量斗争的场域。在科学场内,各个活动因子的力量取决于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科学场通过活动因子的斗争而不断地改变结构。研究者选择何种斗争策略,建立在研究者自身的知识和认知结构基础上,同时受到研究者在场域中位置的客观制约,而且受竞争者的表现影响。布尔迪厄特别申明,科学场的概念与巴斯学派的互动主义视角的区别在于,场的概念承认在实验室之间和研究者之间存在客观结构;与默顿的目的论的区别在于,场的概念指出研究者在研究工作中更倾向于求得一些社会方面的公益。我们还可以看出,布尔迪厄对科学场的描述吸收了库恩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观点,将其表述为是场内竞争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动态斗争的结果。

逻辑主义的视角认为,在科学领域里,科学家都能根据精心安排好的方法和程序,并且按照有意识的、计算好的目的来运作。布尔迪厄采纳了其中的部分意思,换之以‘科学惯习’,即‘科学实践的真正根本是一个学者们的各种性向的生成系统,其中的

大部分作用都是无意识的、可转换的,并且趋向于自我生成的’^[1]。简单地说,就是学者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验工具的使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科学惯习。与逻辑主义视角不同的是,所谓惯习的形成除了受到学科的影响外,还受到社会渊源、国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科学场中的研究者,由于自己的地位和惯习的原因,往往倾向于理解和重视自身惯习所指导的活动,并且不断加强和肯定这种惯习,把它发展到极致。

在批判库恩‘科学共同体’概念的基础上,布尔迪厄指出,科学场不是封闭的。科学场也不是如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认为的那样,受到外界力量的强大限制,而是具有相对的自律性,即‘场域既屈服于外界压力,又处于各种张力之中,各种力量的作用,使场域相对独立于作用在该场域上的外界压力体系’^{[1]79}。自律性是通过数字化而逐步获得的,区分一个场域自律程度的最大特征是‘入场费’的形式的数量。‘入场费’是指研究者的科学资本和对科学的无私追求。科学场结构上的模糊性(即相对自律性),造成‘学者的双重性’,使得‘所有斗争策略既具有纯而又纯的科学功能,同时又构成社会功能(形成人际关系)’^{[1]91}。布尔迪厄的科学场相对自律的观点是其一贯坚持的方法论关系主义的具体体现,从中可见他期望整合二元对立的努力。

资本是作者的重要分析工具,也是其实践观的重要概念之一。布尔迪厄对科学资本构成形式和分配结构的分析,是其科学观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他将科学场中的资本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本身的权威性资本,另一类是社会施加于科学场的权力资本”^{[1]95}。第一种资本是‘行动者投身于科学领域所完成的认识和确认行为的产物,也是他们所占有的全部知识产权’,同时也是竞争者们承认的结果;它依据研究者在科学场中的地位来分配,如‘科学场把信誉给予已经有信誉的人’^{[1]94}。但由于科学场不完全的自律性,权力资本的分配则可以通过非科学途径,如科学场所包含的官僚体制来分配的。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布尔迪厄想要通过科学资本中的权力资本及其分配结构的分析,来回答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实践的问题。

布尔迪厄的‘场域’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动态性体现于场域内部的各种力量斗争中。在他看来,科学场斗争的主体是其中的研究者;斗争力量大小取决于参与者所拥有的资本;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科学资本;斗争的过程是,‘占

①在这个意义上,惯习等同于实践的策略。

主导地位者将自己实践所遵循的原则强制性地规定为普遍原则^{[1]104},而被统治者(潜在革命者)不满足于这样的状况,会采取各种策略改变游戏规则;斗争的结果是使科学场整体上呈现“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的状态。但科学场相对封闭,有其本身的原则(如场内成员共享一般性的认识工具),所以科学场内的斗争是一场有规律的斗争,即在进行变革的同时又能够保留以前的成果。这种观点一方面吸取了库恩“科学革命”的思想,另一方面回答了科学知识何以积累的问题,比库恩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最后,布尔迪厄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科学实践产物的科学知识的本质是什么?科学知识是真实、客观的吗?在逻辑主义的实在论者看来,科学的话语是实在性的反映;在历史主义的相对论者看来,科学的话语是被利益和认知结构导向的一种构建的产物。在布尔迪厄看来,“科学就是一种让某种发现面世的构建”,他自己称之为“实在论的理性主义”^{[1]129}。在这种视角下,科学知识就是一种社会构建;其客观性是科学场中各个主体协商一致的结果;“事实是通过征服、构建和思考,从主体间的辩证交往中得来的,即集体产生、协商、妥协、一致化等程序得来的”^{[1]122}。但布尔迪厄并不就此认为科学认知不可能,而是主张通过反观科学实践活动来保证科学知识的真实性。至此,布尔迪厄对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三、社会科学的自我反思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布尔迪厄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为什么社会科学要反观自身?社会科学如何反观自身?研究者如何进行自我分析?

首先,作者指出,要想使社会科学成为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存在一种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在于:第一,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太重要太棘手,以至于“不能给予与其他科学相同的自律性,也不能让它垄断了产生真理的权力”;第二,在社会科学场内部,也存在不同自律因素互相对峙的现象,比如一些研究者通过非科学手段如权力向另一些研究者强加压力;第三,社会科学入场费低,难与社会性断裂^{[1]145}。这三个特性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与自然科学场相比,社会科学场的自律性程度较低。自律程度低就意味着社会科学场域的运作受到较强的社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既有场域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也有场域内部的利益争夺,还有来自研究对象固有的社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社会建构”^{[1]149},是一门备受争议的学科。因此,它比自然科学更需要反观自身(即

自我反思)。

接着,作者提出了反观的方法——客观化进行客观化的主体。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实践的一个前提是,在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上,将研究对象视为与主体仅有研究关系的客观对象,即将研究对象客观化,就此认为研究主体也就客观化了。这是“客观性陷阱”,也是布尔迪厄所要反思的“历史先验性事物”或称“无意识的决定因素”。因此,要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仅要使研究对象客观化,更要使研究主体客观化。第二种客观化工作要在以下三个层面进行:首先将研究主体在整个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经历及其与社会和宗教关系等客观化;其次将研究主体在社会科学场中的位置客观化(包括研究者所在场域在更大范围场域中的位置);最后,研究者要持有“纯粹的无功利的观点”,将所有与科学场有联系的事物都客观化^{[1]145}。“在着手选择这样或那样的论题、或给物理或化学定这样或那样的方向之时,摆在行动者面前的是两种决定形式:即从行动者的方面来说,有他的经历、他的生涯;从场域的方面,或从客观的空间方面来说,有施加于行动者身上的结构作用”^{[1]101}。因此要反思研究主体的“惯习”及研究者在场域中的位置。第三个层面要求研究者抛弃权力和利益追求,用一种无私的眼光看待学术乃至与学术有关的事物。作者将这种研究风格称为“自反的反思性”,并呼吁社会科学家应该把它培养成科学研究的“惯习”。

那么,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如何进行自我分析呢?作者通过讲述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讲述之前,布尔迪厄强调,一个观点是研究者在某个场域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上所获得的见解,会根据持有者不同的个人特征而有所不同。反思便是对汇集各种观点的空间进行客观化。接着作者回顾了社会科学的历史,以及自己不同时期在社会科学场和科学社会学这个亚场的作为。20世纪50年代布尔迪厄还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哲学专业学生时,哲学处于“胜券在握的时期”,而社会学和人类学“还在初级甚至被轻视的阶段”^{[1]164}。到了20世纪60年代作者进入科学场时,“无主体哲学”重新崛起;社会学成了一门避难性学科,服从于由拉扎斯费尔德从美国引进的唯科学主义的主导模式”。在这个时期,布尔迪厄的求学和研究经历让他“倾向于不使自己限于社会学,而是就整个社会科学场域进行思考”^{[1]171}。在研究中,他拒绝唯科学主义的社会学,同时将人类学和哲学的方法运用到社会学中来。20世纪70年代,哲学与社会科学都在对大学体制的反叛运动中“变得生机勃勃”,但是,哲学依然

试图通过对社会科学进行“历史主义的批判”而维持其“霸权地位”^{[1]178}。布尔迪厄深深扎根于坚实的哲学传统中,这体现在他的著作充满类似于哲学式反思的语句,同时由于是主动选择进入社会学亚场,他也总是在研究中“明确地亮出自己的社会学家身份”。套用他的观点,就是布尔迪厄的经历养成的习惯使得他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张力中处于独特的位置。

韦伯(M. Weber)的价值中立原则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抛弃个人先入之见,而布尔迪厄的反观性要求与此不同。他强调,经验可以通过自我分析在研究中调动起来,使之转化为资本。最后,布尔迪厄再次强调,反观性既要求集体的批评监督,也要求个人进行“以自反的方式进行反观的实践”,社会学的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应该不断地伴随着社会学的实践^{[1]195}。

四、余 论

通过以上介绍可知,在科学知识理论的史册上,布尔迪厄的“科学场”思想也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在对待科学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上,它与科学知识建构论一样,都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而是受到社会因素的巨大影响,从而打破了科学的神秘化地位。然而,布尔迪厄对科学场进行分析的目的“不是要把科学认识与其历史条件简单挂钩,使其限定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之中,从而使这种认识相对化”,而是要“让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运作机制对科学实践的导向作用,从而使自己不仅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而且还要成为从中产生自然知识的社会世界的‘主人和拥有者’”^[1]。由此可知,在目的上,布尔迪厄对科学知识的分析,不是如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论者那样,以怀疑或颠覆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为诉求,而是致力于维护、加强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危机四伏”的时代,布尔迪厄的这种追求给人以信心和勇气。这可以说是布尔迪厄“科学场”观点的最大贡献。

布尔迪厄科学观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就科学场,尤其是社会科学亚场,如何增强自律程度提出了建议。“封闭型”是科学场首要的、最基本的独特资产。它与“入场费”的形式休戚相关,与入场费的数量成正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科学场自律性的基本手段就是提高向新进入者“征收”的“入场费”。

此外,“在非个人化、普世化和去特殊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科学事实,如果处于自律性越大、国际性越明显的场域中,其真正得到实现的机会也越多”,因此,布尔迪厄认为,国际化是对抗国家即时权力的一种措施^{[1]127-128}。这种观点正与当前盛行的“全球化”观念不谋而合。而对社会科学而言,反观性是维护其合理地位、增强其科学性的最重要工具。虽然布尔迪厄不是唯一一个也不是第一个提出反观性要求的学者,但正如前述,他是唯一一个提出反观的详细要求并毕生努力实践的学者。同时,他反思的对象是社会无意识与学术的无意识。因此可以说,在众多提倡反思性的学者当中,布尔迪厄对社会学的反思是最为彻底的。他的反观性要求对社会学研究风格的影响程度绝不亚于韦伯的价值中立要求。

总之,布尔迪厄对科学场的分析让读者看清了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消除了科学的神秘色彩,他的反观性要求则提醒众多学者注意培养一种全新的研究风格,或称研究惯习。此外,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布尔迪厄的科学观也存在某些缺陷。如他对科学场的“入场费”的说明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在资本与场域关系问题上,也有循环论证之嫌。这些问题源于他的场域理论存在的不足。最重要的一点是,布尔迪厄本人的反观性努力,看起来仅仅是在研究成果中加上描述自己经历(或惯习)内容。而实践中,虽然仍旧要求“价值中立”,但研究者经历(惯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同“保守得很好的公开秘密”。因此,笔者认为,反观性要求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皮埃尔·布尔迪厄.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M]. 陈圣生,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2] 郭俊立. 关于科学知识理论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J]. 齐鲁学刊,2005(2):121-124.
- [3] 任玉凤. 社会建构论从科学研究到技术研究的延伸[J].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3-7.
- [4] 王志伟,徐琴. 科学奖励研究的默顿范式及其存在问题[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1):23-27.
- [5] 库恩 T.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胡新和,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6] 布尔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
- [7] 杨善华.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5.